

DOI: 10.53104/dyshfzyj.2026.02.02.002

## 論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聚焦其著作《寫在家國之內：從馬華文學出發的閱讀笱記》

李天甲<sup>1</sup>，陳穎<sup>1</sup>

1. 馬來亞大學 中文系，馬來西亞 吉隆坡 50603

摘要：《寫在家國之內：從馬華文學出發的閱讀笱記》是馬華學者兼作家伍燕翎以“閱讀笱記”為體裁結集的隨筆散文集。它既非單純的讀書感悟，也並非傳統的史料考證，而是一種在個人經驗、文學史意識與公共文化立場之間穿梭的“家國書寫”。本文採取文本細讀法，討論該書如何在笱記式書寫中將“家”與“國”之間的張力轉化為可感的閱讀倫理與學術姿態。

在這本書中伍燕翎的“家國書寫”呈現出三重邏輯：其一，通過“大學青春文學啟蒙”的跨語際閱讀，在域外文本的“他者”視域中反觀本土，建立起“家”的情感；其二，通過對馬華史料的鉤沉、作家譜系的整合與馬來西亞華人族群記憶的重構，將“國”從宏大的政治概念落實為馬華文學內部的歷史責任與華社文化共同體想像；其三，以當代馬來西亞華教命運、知識生產與馬華文學的自我省視，將“家國”進一步轉譯為面向華人社群的公共文化實踐。本文通過分析伍燕翎獨特的“家國書寫觀”，深入瞭解其如何使閱讀成為一種面向華社本土的文化行動，並為馬華文學的自我敘述與身份重構提供有效路徑。

關鍵字：伍燕翎；馬華文學；家國書寫觀；華教

## Ng Yean Leng's Conception of Home-and-Nation Writing: A Study of *Writing Within Home and Nation: Reading No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LI Tian-jia<sup>1</sup>, CHEN Ying<sup>1</sup>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50603, Malaysia

Correspondence to: LI Tian-jia; Email: woaleiex@gmail.com

**Abstract:** *Writing Within Home and Nation: Reading No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the form of reading notes written by the Malaysian Chinese scholar and writer Ng Yean Leng. It is neither merely a collection of reflections on reading nor a conventional work of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Rather, it presents a distinctive mode of “Home-and-Nation writing” that moves among personal experience, literar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a commitment to public culture. Adopting the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book transforms the tension between “Home” and “Nation” into an ethics of reading and a distinctive scholarly stance through its notebook-style writing.

通信作者：woaleiex@gmail.com

引用格式：李天甲，陳穎. 論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聚焦其著作《寫在家國之內：從馬華文學出發的閱讀笱記》[J]. 東亞社會發展研究, 2026, 2(2): 8-16.

Ng Yean Leng's Home-and-Nation Writing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First, through cross-linguistic reading inspired by university literary education, she reflects on the loc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xtual "Other," thereby cultivating an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Second, by recover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reconstructing literary genealogies, and reinterpret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he redefines "Nation" not as an abstract political concept but as a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embedded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s a cultural community shared by Malaysian Chinese. Third, through her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self-examina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he further interpre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 and nation as a form of public cultural practice for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By examining Ng Yean Leng's conception of Home-and-Nation Writing, this paper reveals how reading becomes a form of cultural practice rooted in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and provides a meaningful approach to the self-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Ng Yean Leng;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Home-and-Nation Writing; Chinese education

## 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各國之間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在多重文化激烈碰撞之下，馬華作家身處的多元文化語境和多樣的文化生態賦予了他們不同的生命體驗和感悟。馬華文學傳承了特殊的殖民歷史、複雜的族群關係以及批判的華教體系，呈現出獨特的文學面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是馬華文學中的重要議題。由古至今，家始終是國的基礎和重要組成，國是家的拓深和歸屬。可以說，“家國”一詞中既包括“家”的元素，又包括“國”的元素，由家及國，再以文化傳承的方式，化家為國，家國同構，將家國、民族連為一體，家作為國的重要構成，是國的拓深，是民族的構成。

“書寫”即描寫，“家國情懷”是“家國書寫”的精神內核，“家國書寫”是對“家國情懷”的具象化表達<sup>[1]</sup>。在傳統的宏大敘述中，“家國情懷”往往是一種自覺地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共同體意識<sup>[2]</sup>。但在馬華文學語境中，“家國情懷”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它既關聯南來文人的離散經驗與殖民歷史，也牽動著華文教育、族群關係與在地社群的記憶。因此，“家國書寫”也成為在多重歸屬之間不斷被協商、重構的文化表達。

伍燕翎的《寫在家國之內：從馬華文學出發的閱讀笈記》（後簡稱為《寫在家國之內》）正是在這一歷史語境中誕生的。作為馬來西亞第

三代華人，她長期專注於馬來西亞華文文學與華人文化的研究與教學，並從事散文創作。她作為具有跨國經驗的“在地學人”，其“行在家國之外，寫在家國之內”的學術姿態極具代表性，為當今馬華文學的學術與創作實踐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察視窗。這本散文集不僅彙集了其多年來的散文隨筆與文學思考，更以“家”與“國”之間的張力為核心聚焦，記錄了針對諸多優秀馬華文學及世界文學華文文本的閱讀笈記。全書分為三輯，輯一“寫給大學青春歲月的情書”展現了伍燕翎作為文學讀者的一員在世界文學中閱讀的個人經驗；輯二“狂奔向自由的文學曠野”中伍燕翎開始在馬華作家作品中尋找“本土”認同，對馬華文學史“在場發聲”；輯三“去哪裡都是鮮花綻放”脫離純文學鑒賞，直指大馬華人的歷史創痛、文史研究方法以及華文教育的現實命運。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謂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並不只是指她在書中談論了若干家國議題，而是指她如何以閱讀笈記這一體裁，將世界文學閱讀、馬華文學評論與本土文化關懷貫通起來，形成一種由“他者經驗”回望本土、由文學感受推進到公共文化判斷的書寫方式。其特點並不在於單純抒發家國情懷，而在於她以“在地學人”的位置，將文學閱讀轉化為歷史記憶修復、華教關注與文化認同重構的實踐性思考。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與通常意義上較為宏觀、抒情化的家國書寫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將採用文本細讀法探討《寫在家國之內》中具體的文學評價與知識生產，進一步確定伍燕翎獨特的“家國書寫觀”於當代馬華文學在地創作中的重要性。

## 1 大學青春透過世界文學的家國書寫

《寫在家國之內》的第一輯“寫給大學青春歲月的情書”並未急於進入馬華文學的在地語境，而是以行在家國之外的世界文學閱讀與跨文化文本經驗鋪陳出一條“向外”的閱讀路徑。“路徑”意味著一種歷史過程的動態意義，昭示了自我開放的學術面相，它絕不是返回故步自封的時代，而是對“走向世界”的全新的闡發和理解<sup>[3]163-169</sup>。對此，伍燕翎強調向外的跨國經驗並不是導致文化疏離的誘因，反而是在“誤認”與“追問”的碰撞中求同存異，從而促成對馬華本土身份更清醒的審視。因此第一輯所呈現的正是一條從“他者鏡像”到“自我審視”的經驗鏈條。比較文學形象學認為，“一個作家（讀者）對異國現實的感知與其隸屬的群體或社會的集體想像密不可分，即使他們有機會親赴異國，他們筆下的形象仍然與具體的社會和歷史語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sup>[4]25</sup>。形象因為是他者的形象，故而是一種文化事實，它與一切社會、文化組織都無法分開，因為一個社會正是通過它來反視自我、書寫自我、反思和想像的<sup>[5]124</sup>。據此，伍燕翎行在“家國”之外的閱讀正是借用豐富的域外經驗審視自我，並為後續回到“家國”之內的馬華本土書寫夯實經驗基礎。也正因為如此，這一輯的意義並不只在於鋪陳域外閱讀經驗，更在於呈現伍燕翎如何在不斷與“他者”相遇、比較和追問的過程中，逐漸形成重新理解馬華本土的思想路徑。

### 1.1 書寫行在家國之外的歷史反思

伍燕翎在解讀西西的《我的喬治亞》時並未停留於對微型娃娃屋藝術的讚歎，而是敏銳地捕捉到個人興趣背後隱藏的殖民批判：“要真正建造一座典型的喬治亞風格的房子，幾乎每棟房子都該有一名黑奴在一旁侍奉女主人”<sup>[6]17</sup>。通過對帝國殖民史的解讀，伍燕翎對此拋

出了一個問題：“相較於現代社會，人類的精神文明究竟是朝著更光明的未來發展，還是在走向墮落的深淵”<sup>[6]18</sup>？這一發問引發了她對馬來西亞本土殖民創傷經驗的歷史性思考，即在馬來西亞多元族群的政治與制度下華裔族群同樣有著被排擠過的陣痛。達尼埃爾-亨利-巴柔所說的形象是“作為反觀形象者創造文化的鏡像”<sup>[5]124</sup>。這種從“他者歷史”形象中獲得的頓悟，為她後續書寫馬來西亞的殖民創傷與堅守文化主體性提供了重要的參照。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伍燕翎並不只是從西西作品中讀出殖民批判，更是在“他者歷史”的鏡像之中，重新觸碰到理解馬來西亞本土經驗的位置。

同時伍燕翎指出西西是在“左撇子時代”時創作這本書，這看似是對作家個人風格的描述，實則暗示了西西在限制與困境中仍堅持書寫的韌性，這種韌性本身也對應了伍燕翎內心對馬華文化主體性的堅守。在馬來西亞多元族群的政治語境中，馬華文學的家國書寫本身就是一種在夾縫中堅持、在限制中突圍的韌性實踐。伍燕翎認為馬華文學的書寫選擇應既不逃離本土現實，也不向困境妥協，這種堅持的韌性也為她後來對馬華文學的本土歷史建構奠定了基礎。因此，這裡所呈現的也不只是閱讀中的個體感悟，而是伍燕翎如何由域外文本中的歷史創傷與書寫韌性，進一步回到馬華文學主體性問題的思考。

### 1.2 書寫行在家國之外的當代困境

如果說對西西作品的閱讀是歷史敘事的反思，那麼對保羅·奧斯特《在地圖結束的地方》的閱讀則是對個體精神維度的靈魂叩問。伍燕翎從流浪狗“骨頭先生”的故事中感悟生命的意義：“生活總有偶然與巧合交織，我們無需過度拘謹，要敢於搖擺，敢於追尋渴望。連一隻流浪狗都能在命運荒野找尋方向，我們更要敢於尋找自己的意義與方向”<sup>[6]25</sup>。這段感悟看似是對個人傷痛體驗的情感抒發，實則折射出馬華知識份子的精神困境。1957 年馬來亞獨立後，馬華華裔群體始終處在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的矛盾、華語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衝突、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之中，馬華學者開始在邊緣地帶尋找自己的精神原鄉，而“骨頭先生”用嗅覺而非視覺感知世界的方式，恰恰是馬華學者獨特的



生存隱喻。他們彷彿永遠無法進入主流話語的中心，只能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去感知這個國家的溫度，去尋找自身的位置。伍燕翎指出，早期本土的馬華文史研究長期深陷資源匱乏、資料難尋的現實困境，然而這種學術逆境反而激發了前輩本土學者強烈的文化抱負。正如方修、李錦宗等馬華文史先驅，皆是憑藉一己之力在搜羅孤本、編纂史料，從而為馬華文學的主體性建構奠定了堅實基石。這種隱喻被伍燕翎轉化為一種認識論的自覺，即承認邊緣位置本身具有的認識價值並去創造新的價值，這本身就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抗爭，也為伍燕翎回歸本土書寫傳承華文教育的公共實踐提供了經驗基礎。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伍燕翎所關注的已不只是個體精神上的漂泊感，而是馬華知識份子如何在邊緣處境中重新確認自身文化位置的問題。

同樣，她對於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柯裕棻的《冰箱》以及西西的《白髮阿娥及其他》的閱讀更是確認個體經驗在宏大家國敘事中的獨特性價值。她從渡邊、直子、綠子“死不是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的故事中看到了人類共通的迷惘與成長創傷<sup>[6]32</sup>。在《冰箱》中她對都市人的孤獨與疏離產生強烈共鳴：“那些長久依賴、彼此纏繞的情感，只有在失去之後，才終於得以釋放。而這種釋放，不過是遲來的理解，一種悔悟後的孤獨”<sup>[6]36</sup>。以及《白髮阿娥及其他》中的“借阿娥一人的生命軌跡，映照香港一座城的時代變遷。”這些文本都讓她產生了現代化的思考。在當今現代化的進程中，馬華社會也面臨著華人地緣社群解體、人際關係疏離的困境。伍燕翎通過對個體精神狀態的描摹，揭示了現代性對家國共同體的衝擊，她深刻地明白家國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的政治概念，任何有效的文化保護與身份認同都要落實到個人經驗本身。正是這種對個體經驗的堅守讓她後來在書寫馬華家國時避免空泛的抒情，從而更能落到馬華文學本土作家的倫理關懷上。可以說，伍燕翎正是借這些世界文學文本中的孤獨、漂泊與創傷經驗，把對現代性的感受一步步轉譯為理解馬華社會現實處境的精神線索。

### 1.3 書寫行在家國之外身份認同的重構

拉康認為“自我”是通過“他者”來建構的，“自我”只有通過“他者”或“他者”的眼光才能確證其意義與價值<sup>[7]23</sup>。伍燕翎的跨國閱讀所帶來的“他者”經驗更為其家國書寫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她借由“他者”帶來的經驗來保持馬華本土作家的身份認同，並在世界文學的出走與回望中尋找家國書寫的共鳴與參照。

她對西方離散文學的閱讀為轉向本土華人身份的認同提供了跨文化的參照。在《愛的歷史》中她分析了猶太族群的離散歷史：兩代艾瑪，跨越時空命運相連，一條追尋線索，串聯戰爭、離散、愛情與遺忘。小說不僅寫兒女情長，更是猶太族群文明史的縮影。戰爭撕裂家園，命運顛沛流離，愛與記憶卻始終跨越時光。馬華族群同樣經歷了戰爭、遷徙與離散，同樣依靠愛與記憶來維繫族群的文化認同。伍燕翎通過比較找到了與猶太人擁有《聖經》傳統宗教信仰不同的是，馬華華裔並沒有強烈的宗教認同感作為支撐，而是處在一個多元族群共存的社會中，面臨著更加複雜的身份認同問題。心理學家埃裡克森指出認同是在人與人、群體與群體的交往中所發現的差異、特徵及其歸屬感<sup>[8]91-110</sup>。也正是在這種比較視野下，“本土性”不再是封閉性的地方意識，而成為一種經過跨文化對照之後的文化自覺，即他們必須在多元族群割裂、國家體制邊緣化的困境中，依靠華文教育與地緣文史記憶來維繫文化認同，傳承馬華文化。

查爾斯·泰勒認為“我對自己的認同的發現，並不意味著我是在孤立狀態中把它炮製出來的。相反，我的認同是通過與他者半是公開，半是內心的對話協商而成的<sup>[9]298</sup>。在伍燕翎的域外閱讀中，“出走”是一個反覆出現的詞。她讀艾莉絲·孟若的《出走》被書中那些在平凡生活中掙扎的女性深深打動。艾莉絲·孟若擅長以自然景物映照人心，筆下冬日湖泊清冷寂寥，隱喻人物命運起伏。伍燕翎寫到：“走過人生波折的人，眼底也總會有一面湖，藏著迷茫、期許與掙扎”<sup>[6]40-41</sup>。書中人物不斷尋找、逃離、回望，亦是每個人的人生寫照。這些女性的出走不是對家庭的背叛，而是對自我價值的堅定，也更反映了書寫家國認同不再是單一、封閉的

身份歸屬，而是一種允許個體協商自我價值的開放性共同體。

而對保羅·柯艾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閱讀，則讓伍燕翎對家國書寫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牧羊少年放棄神職，追逐沙漠寶藏，旅途歷經考驗，卻始終堅守初心。伍燕翎認為每個人年輕都有屬於自己的“天命”，心懷熱愛、奔赴理想，整個宇宙會為之助力。小說重心從不在寶藏結局，而在追夢途中的成長與修行。在她看來，馬華作家的“天命”是書寫馬華本土的歷史與現實，傳承華文文化的根脈。而這種“天命”的實現，恰恰需要不斷地“出走”，走出書齋，走出本土，去與更廣闊的世界對話。文化全球化一方面強化了身份的流動性與認同的複雜化，另一方面也刺激與強化了本土性和地方性的認同訴求<sup>[10]79-84</sup>。誠如學者黃萬華所言：“華文文學的‘本土’既是歷史傳統，也是現實情境，它抵抗外來殖民性文化，但也開放於‘外來’向‘在地’的轉換中，促成‘在地’的多元性”<sup>[11]469</sup>。在這一意義上，伍燕翎的“出走、回望”正是把家國書寫從情緒性的懷舊拉回到可反思、可實踐的文化行動之中，本土性不是通過與他者的隔離來維持的，反而是通過與他者的比較、對話、協商而不斷被確認和深化的。在這一意義上，“出走”對伍燕翎而言，並不是離開家國，而是在與他者的對照之中重新確認本土的位置；她所理解的家國書寫，也並不是封閉性的地方認同，而是在跨文化比較中不斷重估馬華文化自身意義的過程。

第一輯的行在家國之外並非是與馬華在地脈絡相脫離的“漫遊”，而是借他者形象帶來的經驗重新理解本土現實。正如伍燕翎在散文集《移動的光》中所說，文學教會她生命中面對的“偶然與必然”，讓她學會“釋懷與安然”這種吸收了世界文學後的開放視野，也正是這種“行在外”的張力，最終變成了她向內叩問、重返家國創作的核心內驅力<sup>[12]</sup>。因此，伍燕翎透過世界文學的家國書寫是借“他者歷史”重新思考馬華文學的問題意識，並在比較視野中重新確認了本土書寫的必要性。

## 2 狂奔向自由的“家國書寫”文學

### 曠野

如果說《寫在家國之內》的輯一是伍燕翎透過世界文學“寫給大學青春歲月的情書”，那麼這本書的輯二則是她邀請讀者一起通過閱讀馬華名作“狂奔向自由的文學曠野”。伍燕翎在這一輯中介紹了22位著名馬華作家與他們的作品，嘗試於閱讀笈記中深入探討當代馬華文學內部複雜的歷史問題、族群關係與文化認同。她的“家國書寫觀”在這一輯中，不再僅僅是抒發身在家國之外的思考，更是一種寫在家國之內並且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歷史背景與現實生活的有效回應。

#### 2.1 向自由的馬華文學世界狂奔

《寫在家國之內》的輯二名為“狂奔向自由的文學曠野”，伍燕翎在此表達的是：馬華文學並非被規範、統一的標籤化書寫，而是在不斷超越、不斷尋找新主體性的馬來西亞華人獨有的創作範式。在閱讀方路的《半島歌手》《火蛋糕》《白蹄狗》時，伍燕翎特別強調一種“狂奔”的姿態。這種“狂奔”不僅是人物命運的漂泊，更象徵著馬華文學長期以來對“自由”書寫的渴望。“方路從詩到散文，再到小說的路向是很清晰的，並且在主題、內容題材和語言方面都有著明確的聯繫”<sup>[13]46</sup>。詩集《半島歌手》中的“運動詩”在馬華詩歌題材中開闢了前所未有的新路向；散文集《火蛋糕》體現了詩人對家國天下之事格外關心，對國家與社會的觀察尤為用心；微型小說集《白蹄狗》彙集了新舊作品，其中的微型小說文字細膩講究，蘊藏著不同的爆發力。“面對創作，方路總是赤誠而不設防：以詩直面現實，以散文與往事告別，以小說盡情放縱。在生命與寫作的種種命題面前，他依然保持自由與專注。這份純粹與執著，使他成為馬華文壇令人敬重的作家”<sup>[6]126</sup>。

伍燕翎在這些馬華文學的閱讀笈記中，並沒有採用傳統文學史式的宏觀論述，而是通過細讀作品中的人物、語言與家國記憶，詮釋出馬華文學應該如何從邊緣位置出發，建立屬於自己獨有的“家國書寫”。伍燕翎認為文學的“狂野”恰恰體現在作家拒絕安分於任何一種固化的身份標籤。正如“作家最幸福之處，莫

過於最終找到一種自由無拘、無羈無絆的寫作狀態。是以，方路是幸福的”<sup>[6]124-126</sup>。

## 2.2 書寫家國記憶與國家歷史傷痕

### 2.2.1 書寫家國記憶

《寫在家國之內》輯二中大量篇幅的書寫圍繞“家國記憶”進行展開。例如對龔萬輝《卯生年代》、薇達《邊境》、李天葆《州府人物連環志》等作品的閱讀，皆體現出伍燕翎對於書寫“家國記憶”的高度重視。伍燕翎在閱讀《卯生年代》後如此評價：“龔萬輝以散文化的小說風格，遊刃有餘地掌握敘事節奏。一則則青春誓言縱然已無法重返，卻仍能追溯其痕跡，勾勒出早已消逝的成長印記”<sup>[6]101</sup>。書中的主人公大多是青少年，雖然年齡尚小，但是情緒敏感。龔萬輝以描寫青春成長與社會轉型時期的迷惘為特色，講述了自己獨特的“家國記憶”。馬華女作家薇達也是馬來西亞新生代小說家中耀眼的明星，“《邊境》更具突破性——書中僅收錄一篇中篇與一篇短篇，卻在主題、佈局、敘事技巧與語言上展現出超越同儕的能量，其實驗與先鋒意味，堪稱當代小說的一股推動力”<sup>[6]133</sup>。有國外旅居經驗的薇達，透過全方位的域外描寫，採用第一人稱視角敘述出“漂泊者”的無奈與孤獨。正如馬華文學也長期存在著一個核心議題，就是“我們屬於哪裡？”即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

對於最初南來的華人而言，中國雖然是文化原鄉，卻已並非現實生活的國家；而馬來西亞雖然是自己生活的國家，卻又在歷史上長期存在著身份認同方面的不穩定性因素。因此，“家國記憶”在馬華文學中往往呈現出雙重結構：既有思想文化上的“中國”，也有現實生活中的“馬來西亞”。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特殊之處在於她並未執著於二元對立，而是嘗試從“家國記憶”切入，去重新詮釋馬華文學。例如在評議《州府人物連環志》時，“《州府人物連環志》的敘事規模並不宏大，人物、情節與時空層次也不及《州府紀略》那般曲折繁複，顯示出李天葆更著力穩健地勾勒華僑移民的生活圖景”<sup>[6]180</sup>。可見伍燕翎關注的並不是宏大的國家歷史，而是諸如州府中的小人物、舊街道等微觀的碎片化國家記憶。這種“微觀歷史”實際上構成了馬華文學的重要根基。

### 2.2.2 書寫國家歷史傷痕

除了書寫家國記憶，《寫在家國之內》中伍燕翎還書寫了國家的歷史傷痕。例如依藤於1957年9月出版的《彼南劫灰錄》，為馬來亞獨立後首部馬華散文集。在《大馬華人史上的黑日——讀依藤《彼南劫灰錄》》中，伍燕翎重新觸及馬來西亞華人歷史中的戰爭創傷與族群記憶。她在書中強調歷史經驗應該如何持續影響當代人的精神結構。“這四十篇散文記錄了華人同胞親歷的民族災難與歷史記憶，彷彿一幕幕黑白影像在眼前重現。從英殖到日占的種種事件，不僅展現了華人社會反殖民鬥爭的決心，也深刻影響了國家與民族的建構過程”<sup>[6]137</sup>。這類書寫具有強烈的“傷痕記憶”意義。追溯與重構歷史記憶是華人與故土聯繫的重要形式，阿萊達·阿斯曼認為歷史是提供關於自己來歷和身份認同資訊的工具，它檢視和保留了值得回憶的、建構身份認同和指向未來的東西<sup>[1]445</sup>。其實對於馬華文學而言，“家國”很多時候都不是“穩定”的代表。英殖歷史、日據時期、獨立後的民族政治，這些傷痕都在不斷地重塑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處境。因此，很多時候歷史並不是過去式，而是持續存在於當下的陰影。

尤其在《寫一出鬧劇影評——淺評賀淑芳〈別再提起〉》中，伍燕翎不僅討論歷史傷痕回憶式的文本形式，更觸及馬來西亞華人在社會關係中的身份疏離感與邊緣情感困境。“小說裡，這位舅父在妻子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改宗，最終導致他死後，本應莊重的葬禮，卻演變成極具諷刺意味的‘搶屍’鬧劇。當然，這場看似鬧劇的背後，其實折射出整個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文化的深層記憶”<sup>[6]176-177</sup>。傳統對“家國”的書寫往往強調國家、民族與歷史使命等方面，習慣站在宏觀角度去論述行文，而可能因此忽略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但通過伍燕翎的閱讀恰恰展現另一種可能：“家國”並不僅僅來自政治話語，它同樣存在於個人感知、親情關係與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她所提倡的“家國書寫”從來不是簡單而宏觀的文學敘事，而是一種細膩入微、更具情感溫度的文化載體。“屍體最後終於大便完畢，並以一個響屁作為結束”<sup>[15]260</sup>。看似荒誕，實則痛心。賀淑芳的《別再提起》不僅是鬧劇，更是悲劇。而且



馬來西亞這幾十年來，居然真的發生過類似的“搶屍”事件，也許這是國家的歷史傷痕仍在“滴血”。

伍燕翎在評價《寫在家國之內》輯二的這些馬華作品時，展現出她慈憫的人文主義關懷。她所關注的並不單純是馬來西亞發生的歷史事件本身，而是馬來西亞華人在家國記憶與國家歷史傷痕中的命運多舛。例如，戰爭如何改變華人的情感認知、離散如何塑造華人的身份認同、傷痕如何影響華人記憶等。這些文學評價，使她的“家國書寫觀”更加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色彩，她試圖透過這些閱讀笱記重新留存那些容易被馬來西亞國家敘事遺忘的華人個體記憶。

### 3 鮮花綻放般的“家國書寫觀”

如果說《寫在家國之內》輯二主要關注馬華文學內部複雜的歷史問題、族群關係與文化認同，那麼輯三“去哪裡都是鮮花綻放”則進一步推動了馬華文學之外的文化實踐。“至於融會貫通，則更進一步，將文學的思維與感悟延展至歷史、社會、哲學等廣闊領域，從而形成跨界的理解與洞察”<sup>[6]</sup>。在這一輯的文學評論以及其對中文系、新紀元大學學院的書寫中，伍燕翎不再只是閱讀者角色，同時也是文化推動者與馬華文學作家。她的“家國書寫觀”也因此從文學評價延伸至馬來西亞華教、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華人社會未來的建設中。如果說前兩輯中的伍燕翎主要還是以閱讀者和評論者的身份展開家國書寫，那麼到了這一輯，她的關懷已明顯由文學文本內部延伸到歷史真相、華文教育與跨國文化認同等現實議題。也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她的“家國書寫觀”不再只是對作品的理解與評述，而進一步成為一種面向華社現實的文化實踐。

#### 3.1 書寫馬來西亞的歷史真相

《寫在家國之內》輯三開篇的〈歷史站在真相那邊——讀《越洋控訴——峇冬加里屠殺慘案》〉，展現伍燕翎閱讀笱記中對“家國書寫”歷史意識的強烈認同。峇冬加里慘案長期處於殖民歷史的陰影之下，而伍燕翎通過閱讀與評論，將文學與歷史記憶串聯起來。她一再

強調“真相”的意義，實際上是在反思國家歷史敘述中的沉默問題。正如她所寫：“若非郭仁德與郭義民父子合著《越洋控訴——峇冬加里屠殺慘案》，首次完整揭示事件真相，這場血案或將徹底湮沒於歷史陰影”<sup>[6]</sup>。

對於馬華社會而言，歷史不僅關乎過去，也關乎馬來西亞華人是否能夠被看見。若歷史被人遺忘，族群記憶便也可能被殘酷抹除。因此，伍燕翎文學評論的家國書寫也同時具有明顯的文化保存意識。她試圖通過閱讀與評論，讓被邊緣化的歷史真相重新進入公共討論空間。在這裡，閱讀已經不只是理解文本的過程，也成為重新召回集體記憶、推動歷史發聲的一種方式。更令人欽佩的是伍燕翎將歷史教科書中長期強調的在基礎建設上做出巨大貢獻的英國殖民者，其殘暴、殺戮的另一面再次呈現給當今讀者。不僅歷史真相歷歷在目，馬來西亞華人的族群記憶也因此得到了恢復。

#### 3.2 書寫華文教育的文化使命

《寫在家國之內》輯三中多篇文章討論馬來西亞大專院校（以新紀元大學學院為主）的中文系、高等教育與文學研究，例如〈中文系的自我定位〉〈寫作與學術何為？〉〈分水嶺上的新紀元——兼談民辦大學何為？〉等。這些文章表面上討論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問題，實際上也體現出伍燕翎對於華教未來的擔憂。

在馬來西亞的語境中，華文教育不僅是單純的語言教育，更關係到華人對傳統文化的繼承。馬華學者何國忠曾言：“如果說文化是族群的根本，那教育就是維持這個族群特性的最好方法”<sup>[16]</sup>。哈羅德·伊羅生認為，語言是打造民族的素材之一，它喚醒族群意識並使之得以延續至後代，若沒有語言，民族即不存在<sup>[17]</sup>。中文系之所以重要，並非因為它能培養文學研究者，而是因為它維繫了華社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記憶。“新紀元大學學院在漢語教學專業的建設中對境外實踐教學所進行的探索，對於海外漢語教學專業的建設和漢語國際教育事業的推進都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意義”<sup>[18]</sup>。可見新紀元大學學院在馬來西亞對漢語教學的推動，而伍燕翎進一步強調的，則是“寫作與學術”在華教體系中的意義。在功利主義日益擴張的時代，人文學科（包括中文系）常被視為

“無用”。但她認為“尤其在馬來西亞這個多元語境中，國家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中文專業人才？這，正是值得深思的課題”<sup>[6]217</sup>。因此，她的“家國書寫觀”並非站在頑固不化的民族主義式排他立場，而是一種聚焦華文教育的文化主體意識。她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馬華社會在面臨當今全球化與現代化的社會變革中，如何能夠繼續保有自己文化的聲音。也正因为如此，這裡的“家國書寫”已不再只是文學層面的表達，而是進一步落實到文化傳承與教育建設的問題之中。這不僅是她推動華文教育的初衷，也體現出馬來西亞華教工作者所面臨的文化責任。

### 3.3 書寫跨國流動中的文化認同

《寫在家國之內》輯三還書寫了伍燕翎作為馬華作家的跨國經驗。無論是她書寫出國到訪印尼山口洋、在日本創價大學的訪學生活，還是關於其他旅行與文學活動的書寫，都體現出伍燕翎對於“跨國流動”中文化認同的理解。

傳統的“家國”觀念往往強調於固定的土地與民族邊界，但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則呈現出一種更加開放的文化視野。對於身在國外的華人而言，“家”未必只有一個，“國”也自然不只是政治疆界。在跨國流動的過程中，其文化認同會呈現出不同的狀態。因此，輯三“去哪裡都是鮮花綻放”這一命題本身，便象徵著一種開放的文化態度：即無論身處何處，只要家國的文化與記憶仍在，便可以隨時重新建立精神歸屬。由此可見，伍燕翎在這一輯中所展開的，已不是單純的“出走”經驗，而是如何在流動中重新理解文化歸屬，並把這種跨國經驗轉化為對馬華本土認同的重新思考。這種跨國流動的視野，使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突破了傳統的民族主義框架，轉向一種較為開放的馬來西亞華文書寫觀。

伍燕翎的《寫在家國之內》雖然以“閱讀筭記”的形式書寫，但其背後隱藏著她對於馬華文學文化認同與歷史地位的長期思考。在輯一“寫給大學青春歲月的情書”中，她以世界文學閱讀與跨文化文本經驗建構出一條由內而外的閱讀新路徑。而在輯二“狂奔向自由的文學曠野”中，她又通過對國內多名馬華作家著作的閱讀，展現出馬華文學如何在國家邊緣處境中建立其主體性。她強調聚焦於馬來西亞的地方經驗、歷史記憶與個體命運，使“家國書寫”從抽象的民族概念轉向具體的生活世界。最後在輯三“去哪裡都是鮮花綻放”中，伍燕翎則進一步將其“家國書寫觀”延伸至文化實踐層面。她關注歷史真相、華文教育、高等教育發展與跨國文化交流，展現一位馬華作家與馬華教育工作者對於未來華文文化在本國有效傳播的責任意識。

由此，伍燕翎的“家國”並不是單一、固定的政治概念，而是一種流動的文化認同。它既包含對馬來西亞華人歷史的追溯，也包含對這片蕉風椰雨中的土地深深的情感；既重視本土的地方經驗，同時還兼具跨國的國際視野；既聚焦於國內外的優秀文學文本，也強調現實生活中的文化實踐。伍燕翎並未以宏大口號定義“家國”，而是通過閱讀筭記的撰寫、促進恢復族群記憶、從而提倡華文文化行動，讓“家國”成為一種能夠被感受、被思考、被重新書寫的精神空間。在當代馬華文學評論的研究中，這種兼具本土文學性、歷史人文關懷與文化主體意識的書寫形式，體現出馬華作家對於國家歷史與未來展望的持續關注。在“家”與“國”之間，在“在地”與“世界華文文學”的交會處，這些筭記記錄了閱讀當下的遲疑、共鳴與追問。《寫在家國之內》是寫給文學讀者的書——不為指引方向，而是邀請同行，在家國之內，也在文字之中。

## 4 結論

### 參考文獻：

- [1] 任珺. 論張恨水散文中的家國書寫[D]. 安慶: 安慶師範大學, 2021.
- [2] 夏德元, 編. 家國情懷[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6.



- [3] 李騫. 論新時代長篇“家國情懷”的寫作路徑[J]. 文藝爭鳴, 2025(12): 163-169.
- [4] 孟華, 編. 比較文學形象學[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 [5]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 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M]. 孟華, 編. 比較文學形象學.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124.
- [6] 伍燕翎. 寫在家國之內: 從馬華文學出發的閱讀笱記[M]. 有人出版社, 2026.
- [7] 方生. 後結構主義文論[M].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9.
- [8] 袁娥.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研究述評[J]. 民族研究, 2011(5): 91-103, 110.
- [9] 查爾斯·泰勒. 承認的政治[M]. 汪暉, 陳燕谷, 編. 文化與公共性. 北京: 三聯書店出版社, 2005: 298.
- [10] 劉小新. 鄉愁、華語文學與中華性[J]. 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6(12): 79-84.
- [11] 黃萬華. 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研究[M]. 南昌: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22.
- [12] 伍燕翎. 移動的光[M]. 大將出版社, 2007.
- [13] 曾維龍. 論方路的跨界寫作: 從詩到奈米小說: 在地的創作實踐[J]. 華文文學, 2021(157): 43-49.
- [14] 阿萊達·阿斯曼. 回憶空間: 文化記憶的形式與變遷[M]. 潘璐,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 [15] 賀淑芳. 別再提起[M]. 賀淑芳. 迷宮毯子. 臺北: 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2: 260.
- [16] 何國忠. 馬來西亞華人: 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M]. 華社研究中心, 2006.
- [17] 哈羅德·伊羅生. 群氓之族: 群體認同與政治變遷[M]. 鄧伯臣, 譯.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
- [18] 王睿欣. 馬來西亞漢語教學專業境外實踐教學初探: 以新紀元大學學院為例[J]. 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 35(1): 128.

## 版權聲明

© 2026 作者版權所有。本文依據“知識共用署名 4.0 國際授權合約”(CC BY 4.0)以開放獲取方式發佈。該許可允許使用者在任何媒介中自由使用、複製、傳播與改編文章(含商業用途),惟須明確署名原作者及出處,並注明所作修改(如有)。完整協議詳見:<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deed.zh-hans>

## 出版聲明

所有出版物中的陳述、觀點及資料僅代表作者及供稿者個人立場,與 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編輯人員無關。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編輯人員對因內容所提及的任何理念、方法、說明或產品所導致的人身或財產損害概不負責。